Globethics Repository



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思潮和牛津共識 [“Christian Faith and Current Ideological Trends in China” and Oxford Consensus 2013]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U, Xiaoho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8 06:34:5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412

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思潮和牛津共識

朱曉紅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副教授
復旦大學哲學博士

一、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英國牛津大學召開了「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思潮」（Christian Faith and Current Ideological Trends in China）學術會議。會議由國內民間機構「中國神學論壇」發起，牛津大學威克里夫學院（Wycliffe Hall）和牛津宣教研究中心（Oxford Center for Mission Studies）承辦的，據承辦方統計，參會者百餘人分別來自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域、歐洲和美國的二十九所高校，十一個研究中心，十二個非政府機構和基督教機構。這次會議最有特色的是邀請了大陸新儒家、自由主義者、新左派和基督教學者二十餘人，這些學者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大多頗具社會及學術影響力，由於他們對國內公共領域的一些問題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國內極難有可能一起坐而論道。讓這些學者相聚一堂，反省自己的立場、聆聽他人的聲音、進而對中國的未來進行展望，實在是難得一見的盛事。

二十日下午，隆重的開幕酒會和晚宴在牛津大學最古老的莫頓學院（Merton College）內舉行，會議組織三方的代表，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馬元石（音譯，Wonsuk Ma）

主任、威克里夫學院的勞埃德（Michael Lloyd）院長、中國神學論壇創始人王文峰先生分別致辭，表達了對會議的期許，希望在牛津大學的開明氛圍中，各思潮的代表人物能通過真誠的學術討論，彼此理解；從而打破學術和思想壁壘，形成社會共識；同時也促使各思潮和古老的基督教文明對話，挖掘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信仰對中國發展可能的貢獻；讓西方學界了解中國思潮，也讓國內學者了解海外面臨相同的現代性困惑的國家如何處理類似的問題，從而推進思考的深入和文化的交流。接下的三天是緊湊的論文發表和討論的時間。會議會場設在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獨特的辦公大樓內，該樓由具有百年歷史的老教堂改造而成，每天會議召開之前，有加拿大以馬內利學院（Emmanuel College of Victori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聖樂總監林瑞峰博士負責的音樂崇拜禮儀，讓不少中國學者初次領略到基督教禮儀的莊嚴和美麗。會議結束後，不少學者參加了劍橋一日游，以及周日在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大教堂舉行的周日禮拜，基督學院是英國國王冊封的大教堂，在英國級別極高，校園也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電影系列的拍攝地之一，通過這些考察活動，學者們感受基督教文化和英國社會政治、高等教育之間的緊密聯繫。

二、

三天會議的討論是按照不同主題安排的，第一天為自由主義和基督教在中國，第二天是中國的基督教和新左派思想，第三天是基督教和新儒家思想。出於時間平衡及其他因素上的考量，有些論文並非當天的主題，本文則按照時間和不同主題，將會議內容進行整理。

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光滬教授主持了國內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徐友漁和秦暉的專場報告。何教授認為，國內自由主義的傳入經過三個過程，第一階段是十九世紀末，以嚴復等人翻譯穆勒和亞當．斯密的著作進入中國為先聲，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以國富民強為主線，個人自由只是第二位的關切。第二階段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思想界圍繞着人的價值和思想解放，展開了「新啟蒙」的運動，以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西方自由化而告終。第三階段從二十年代鄧小平南巡開始到現在，自由主義學者組織出版了各類文叢，影響很大，但漸漸地，自由主義者們出現了分化，有的甚至出現了從右到左的轉向。因此有人說，自由主義者缺少社會參與的具體主張，目前已經進入頹勢。中國社科院的徐友漁教授的論文分析了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自由主義思潮產生的背景和特徵，指出在早期自由主義倡導者那裏，宗教思考是缺位的，如八十年代的王若水和于光遠，宣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李澤厚講主體性是文學美學和倫理學的進路，直到進入九十年代中期，基督教思想的維度才開始進入社會思潮。隨着「後學」（後現代和後殖民）思想的進入，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們開始了分化，始有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爭論，在市場的作用和社會不公的原因、全球化、中國國情、前兩次自由主義的運動的作用以及民族主義等諸多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文章最後討論了三位學者何光滬、叢日雲和王怡在宗教地位、宗教和西方憲政政治關係問題上的不同觀點，認為基督教思想對當代中國思想文化具有積極作用，基督教和自由主義在中國有天然的親和關係。秦暉教授題為〈「聖徒」還是「神學家」〉的論文則針對自由主義者實踐難的問題，對自由主義的信念和原則進行

了論述。他認為，中國現實問題是如何「走出奧茨維辛」，給予民眾選擇權的問題。從權力的角度看，不僅僅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還存在第三種自由，那就是「利他的自由」，在第三種意義上，作為實踐者的自由主義者與基督宗教中的聖徒沒有區別，都需要獻身的精神。秦教授發言中指出，中國的自由事業是世俗的事業，同時也需要宗教的精神去實現。

何光滬教授的論文〈當代中國的國家目的——一種基督教角度的思考〉延續了其一貫的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對比儒家和基督教思想中對邦國目標的設定，認為現代國家不應以自身為目標，將國家權利、富國強兵和一族復興置於公民權利、公平正義和世界太平之上。香港中文大學邢福增教授則通過劉曉波不同時期作品中出現的關於十字架的隱喻，分析基督教思想對這位政治異見者的塑造和影響，認為自由主義和基督教同為支持和推動他的思想資源，也在另一個角度呼應了秦暉教授關於實踐的自由主義者具有聖徒人格的論斷。北京大學社會學家鄭也夫教授從國家政策對中國教育的破壞、對部分公民教育權的剝奪的角度，回應了當今中國國家和個體之間的不對等關係。

第二天進入「在中國的基督教和新左派」的主題，湊巧的是，這天薄熙來在山東法院開始接受審判，主持人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所長以此為契機，以俏皮的話語揭示出市場經濟加實用主義給當今中國帶來的問題，也指出馬列主義和宗教信仰並無根本矛盾的事實。復旦大學的呂新雨教授則以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著作文本分析着手，認為「後學」特別是解構主義傳入中國，和「後八九」時代的中國想像具有一致性，她的報告〈解構主義、神學和啟蒙精神〉一方面表明了德里達的解構理論

即是對啟蒙精神的徹底反思，同時也是對啟蒙精神的強勁延續，另一方面也指出解構哲學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他者」和「正義」，即帶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也有基督教末世彌賽亞的精神痕跡。她最後提出，解構主義的「反西方主義」可以對處理當下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對內對外問題、「大國」建立自我認同和國家意識等層面提供方法借鑒。中國社科院《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的副主編、當代左派話劇《切．格瓦拉》的編劇之一、《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中文版的劇本改編、《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黃紀蘇，則以北京天主教東堂前庭變成市民健身廣場為觀察點，惟妙惟肖地刻畫了市民心理以及歷史變遷中宗教的地位轉變，表明了後毛時代基督宗教的復甦、發展，以及對社會公共空間的佔有和影響。

儘管前一天討論中大多數認為基督教和右派有天然的親和性，當前的新左派缺乏對基督教資源的關注，台灣中原大學曾慶豹教授關於「中國激進主義基督教與新左派對話」的報告通過詳盡的史實表明，早期左派如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及工運領袖惲代英等都對基督教有高度的評價，而基督教內的激進派如社會福音派等，批判帝國主義和跨國資本、關注社會公義等主張，與左派思想非常相近，儼然可稱作「中國解放神學」，當今的新左派應該以史為鑒，在建構中華現代性的時候，吸納基督教的資源。

華東師範大學的許紀霖教授和羅崗教授指出，「新左派」一詞在過去二十年間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兩人對這種變化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和期待。許紀霖教授指出，新左派分化為學院新左、民間新左（又有類似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區別），中國思想地圖非常複雜，隨着新媒體的發展，網絡民粹主義需要啟蒙，因此，各派理清分歧，尋求共識，

彼此尊重顯得非常必要。而羅崗教授則以「兩種改革」為題，對中國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進行了回顧，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中中國地位的上升表示了樂觀的贊許，指出一般人（尤其是自由主義者們）會從國家和市場對立的角度來思考當今中國的問題，將問題歸結為國家主義，將希望寄託在啟蒙時代，這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也無法滿足強國發展的世界格局的期待。芬蘭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黃保羅教授則以「基督教事業下處於國家政權利維坦和自由主義野馬之間的新左派」為題，對新左派的發展歷史和嚴格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在分析了新左派和自由派在處理六大根本問題上具有重大缺陷之後，將基督教看作是中國社會問題的可能良方。

第三天的主題圍繞着新儒家和基督教。主持人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姚西伊教授指出，與歷史中的儒家正統地位不同，也與其他社會思潮的呈現形式有異，新儒家一般在民間活動，呈現自下而上的復興趨勢。國內新儒家的代表，首都師範大學陳明教授採納了青年學者周偉馳關於太平天國是一場宗教戰爭的看法，認為正是由於洪秀全等人都受到基督宗教思想的影響，這場戰爭表明了一種文化緊張，突顯了基督教進入中國並融入中國的困難和必要性。中國的歷史和現在都表明，以儒教為主體的文化是包容的，因此自古以來都體現出文化和民族的高度融合的特徵，比如孫中山是基督徒，但卻用儒家道統來論述自己的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和價值基礎，如今基督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在中國社會也需要重視本土化和社會融入的問題。針對不少基督教學者宣稱的基督宗教不是一種西方宗教，而是一種普世宗教，它的普世價值被各地教會所共享的看法（如伯明翰大

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榮休教授康威[Martin Conway]以及瑞士全球倫理網站總編輯司徒博[Christoph Stukelberger]），陳明顯然不甚認可。姚中秋（網名秋風，北京航空航天工業大學）和陳明一樣認為儒家是開放的，但是他認為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一種「文教」，即一種教化系統，通過經典和教育體系的完善來維護心理秩序和社會秩序。因此，儒家雖然有宗教性功能，但並不是自成體系的宗教，正因為如此，它才得以和釋、道共融，一言概之，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形態是「一個文教，多個宗教」。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的楊鳳崗教授同意姚中秋所講的儒家不是一種宗教的說法。但是他提出，也許在未來，儒家和基督教都可以作為公民宗教的有機組成部分。他以美國社會「基督教會、民主制度、公民宗教為主題」，介紹了基督教對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和權力運作制度的影響，認為美國的公民宗教以基督教為底色，但也不能等同於基督教。未來中國社會若要建構公民宗教，也定然可以採用這樣的路線。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教授從「天道與神意」出發，對中西方的憲政主義的起源進行了比較，憲政主義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起源，形而上的起源來自宗教文化傳統。他認為，西方的憲政與基督教思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中國憲政主義則是儒學起源，前者相信獨一位格上帝，後者從天人感應發展到君權神授，兩者的這種形而上的差異，帶來了社會制度的差異，在建設憲政社會的今天，我們應當比較借鑒。盛洪教授對中西憲政的不同形上學起源的報告中，提到儒家憲政的問題，可能會讓某些主張憲政來自西方的學者不安，但會議中似乎沒有人提出這點。卓新平教授隨後的發言〈基督教思想的中國處境和文化適應〉呼應了陳明教授的觀點，認為基

督教在華的積極文化適應和「中國化」，與中國的「開放」和「走向世界」是相輔相成的。美國創欣神學院（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李錦綸在〈中國天道觀的神學詮釋——新儒之外的選擇〉做了文化對話的嘗試。

儘管不同的學者對儒家是否宗教的態度很不相同，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干春松認為，儒家是否「宗教」取決於定義和理解，康有為就將孔教視為國教；不過，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宗教文化可以為民族國家提供價值載體，應該作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歷史上的儒家思想是包容的，如今也應該具有自信和寬容。

會議對上述三個方向的探討還有很多不同角度。比如從宗教政策和憲政的角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澎教授繼續為宗教立法搖旗吶喊。不過，有學者指出，如果能把憲法中關於宗教自由的原則落在實處，根本無須宗教法也能解決當前問題。不少學者提及法制、公民權利、公民社會和宗教自由一樣，都是一個更為公平正義的中國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很多學者還從基督宗教傳統如何參與社會及未來發展的角度來報告或回應。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鄭家棟教授回顧「漢語神學」的發展，指出漢語神學作為一種「人文神學」，並不必然要本地化，但是漢語神學作為一種教會神學，具有終末論的向度，必然要有本土教會經驗，要和公共領域發生關聯。他認為，目前在中國，這種能跨越「教會性神學」和「人文性神學」之間鴻溝的神學「幾乎還看不到曙光」。台灣神學院的林鴻信教授則論述了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對自然理解的變化，指出這種自然神學作為信仰群體的表述，對漢語神學有着特別的意義，因為它將上帝國的普遍要求法則內在落實在人類共同生活的「自然」圈中，這就要求神學在此

基礎上與其他學科對話。武漢大學趙林老師用詳盡的數據表明，最近幾十年基督教的全球發展和擴張應該對國內各種社會思潮提出了挑戰，當然也對基督宗教和漢語神學提出了挑戰，如何建立本地化或處境化的基督宗教成為當今最現實的問題。復旦大學朱曉紅教授則從多個角度分析了中國天主教內部合一的最大問題和相關歷史現實背景，並用天主教上海教區為例來討論現實的解決方案。

香港浸會大學費樂仁（Lauren Pfister）教授用社會學中「後世俗化」理論來分析當代中國人具有的四種宗教立場：抗拒後世俗的世俗主義者，策略性接受後世俗的世俗主義者，參與後世俗的學者，參與後世俗的宗教學者，並以此來看中國哲學界中左派或自由派的差異。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楊富雷（Fredrik Fällman）教授則對中國不同時期的宗教政策進行了梳理，討論和諧社會理想下基督教和儒家應有的貢獻。

三、

會議的組織方表示，將不同學者放入不同的主題探討，也有出於會議安排中時間平衡的考慮，因此，對學者的四個思潮的劃分看上去有些機械。有學者也宣稱自己可能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許紀霖），很難歸為某一類。但學者們一致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思想界的分水嶺。如果說八十年代爭論也很多，大家還是能找到共同的話語，而九十年代的分化的知識界，政治立場迥異，利益和話語點均不同，各思潮間（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的矛盾越發激化，不可通約。會議上，學者們爭論的激烈程度也再次證實了這點。這裏我將會議中討論的一些焦點問題進行報告。

就思潮本身的冠名而言。學者們指出，中國思想界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用法，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中國思想界講自由的含義，也和西方的具體訴求不同（秦暉）。比如，在中國思想界，有只談經濟的自由主義者，但更多的是談論個體自由、對國家權力的限制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很多人直接參與爭取民主和維權的社會活動中，甚至成為異見者，這和西方自由主義的保守形象不同。新左派關注公平和社會正義，但是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態度是含混的，在對各種西學的吸納上，夾雜着諸多民族主義的想象，在政治上呈現出一種保守形態。正如曾慶豹教授所尖銳批判的，中國的新左派已經成為盛世帝國的內部殖民的辯護者，他們無法如西方左派那樣主動與強權者保持距離。

學者們還指出，各種術語的意義是有變遷的，二十年來左派和自由派所指或他們所主張的都有變化。而且，不同派別下面也有訴求差異的不同群體（許紀霖、黃保羅等），如新左派下面有學院左派和草根左派，新儒家裏面有溫和與激進新儒家之別，而基督宗教更是有不同宗派，還有福音派、靈恩派等等的差異。當人們用這些術語的時候，需要有具體所指。在另一種意義上而言，這些變遷是和具體情境相關的，因此，理解國內各大思潮的主張，也應該放到具體情境中看，每一次學派間的交鋒，都有具體的背景（黃紀蘇）。同樣地，當我們用西方的觀念或理論來理解中國現實的時候，不能完全從學理去繞（中國政法大學金雁教授）。當然，在中國具體現實中了解各種思潮的時候，也應承擔普世價值和關懷。

就幾大思潮之間的關係而言。不少學者認為基督教和自由主義有天然的親和力，比基督教和新左派的關係更

近，而儒家則比較中性。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全喜教授認為，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理論，確定的是共同體中建立共同交往的平台，與基督教為社會提供的思想資源相近。學者們也注意到，十九世紀的左派是國際主義者，追求自由平等博愛，對理性自信，相信社會進化。而如今中國的新左派採用「後學」，已經轉移到對啟蒙現代性的解構、對構造反西方民族主義的「中華性」上去了。儘管他們對現實問題的認識可能比自由主義要深刻，但是迴避了對社會的道德判斷。不少自由主義學者（秦暉）和新儒家（陳明）、基督教學者（曾慶豹）等對這點提出了尖刻的批評。新左派學者復旦大學呂新雨教授則認為，構造中華性不一定就是政治不正確；而我們看到的一些現象，並非可以完全歸因到意識形態或價值觀觀念的變化，比如東歐劇變是工農聯盟邊緣化造成的，正如當下中國農民工被邊緣化一樣，這裏更多是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全球化資本帶來的問題。

針對不斷涉及的中國特殊性和普世主義的關係問題，高全喜教授用中國百年憲政發展之路來說明只有在普遍性的底色中，才能實現中國特色，才能建立中國自己的主體性。認為在這個意義上，需要的是中庸之道、交流和合作，而不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衝突。在另一個意義上看，國家價值的確立、國家認同的實現，以及中國夢的實現，都需要順應普世價值，而不能僅僅強調中國特殊論，各大宗教都應該一起參與討論（許紀霖）。一些西方學者如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林特斯（Richard Lints）教授也回應說，生活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與他者文化相遇不是目標，耐心聆聽並進入他人的故事才是智慧的選擇。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森蓋茲

特（Scott Sunguist）以及牛津宣教研究中心哈維斯（Thomas Harveys）教授認為儘管中國發展有特殊性，但是中國已經並需要在世界尤其東亞承擔起更大的共同責任，因此，當前各種思潮進行對話是重要環節；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的托蘭斯（Iain Torrence）教授認為，基督教也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去參與並同時承擔其宗教內和宗教間對話的責任。

自由主義和基督教都強調普世價值的重要性，但是不同的學者對普世價值的基礎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指出，不能因為自由主義和基督教兩者對個體尊嚴的強調而倉促地將兩者聯繫起來。自由主義更多是的受現代啟蒙思想和世俗理性的影響，如果不對啟蒙和理性主義的遺產做深刻的反思，那麼，自由主義就無法將理念貫徹到現實中。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中國新左派理論來源之一的後現代理論對啟蒙理性的諸多批判也是值得借鑒的。就其中提到的自由，有學者認為，自由主義最早接受的是希臘傳統，拒斥基督教，倡導的是理性神，因此，自由主義和基督教的親和性並不應該太過擴大（盛洪）。也有教授指出，啟蒙精神所講的自由確實是個世俗的概念，但是有基督教的影響（秦暉）。更有教授指出，如果從自由的角度看，有世俗的自由主義，有神聖的自由主義，而在政治層面看，宗教信仰自由是國家要給予公民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楊鳳崗）。針對自由主義學者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富勒神學院前院長毛瑞祺（Richard Mouw）在評論中指出，基督教的社群觀念，比如愛鄰人的道德要求，對人類繁榮和市民社會的培育是有幫助的，也是對西方個人主義氾濫所造成的個人囚徒困境的一種校正。林鴻信教授在評論中指出，基督教提倡的是一種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追求的是共同

善，而不僅僅追求個體權益。因此，基督教的思想對自由主義可以是一種很好的補充。

有不少學者提出，基督教和儒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難兄難弟，在當今公共領域中的作用也頗為尷尬，儒教甚至更糟，因為經過歷次文化運動的影響，儒家主體性不復存在（楊鳳崗）。再加上現今社會結構更多是個人取向，而非家族或集體取向，因此，儒家之於國人，並不比基督教與國人更近（鄭也夫）。傳統鄉村社會組織更是因為自由主義和市場的衝擊而崩解。不少新儒家希冀自上而下去恢復傳統，因缺少鄉村建設這一環節的設想，這樣就只能以當前這樣斷裂的方式去存續傳統（呂新雨）。儒家學者也認可這個評估。學者們認為，新儒家和基督教的興起，為世俗社會注入了神聖因素，它們可以成為建構公民社會的底本，共同抵禦社會價值的破碎；和而不同是儒家思想的特徵，儒家完全有能力接納基督教。

幾乎所有儒家學者均表示對用基督教改造中國社會的激進想法的憂慮，他們認為，基督教是外來而非原生的宗教，未經過充分本地化，就奢談它對憲政的意義，只會帶來如太平天國運動般的災難（陳明）。也有人提出，教會具有終末性，但是終末和現實總是有張力的，在人間實現天國的衝動也是可怕的（鄭家棟）。也有基督徒學者指出，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因為基督教有很多種，社會立場也多樣化，兩千年來形成很多社會關懷的基本原則，影響到社會公共政策，但這只是為社會提供框架，而不是具體方案（姚西伊和赫爾辛基大學羅明嘉[Miikka Ruokanen]）。有鑒於長期對中國基督宗教的觀察，著名基督教史學家裴士丹（Daniel Bays）認為，在未來的幾十年裏，基督教參與實現自由社會的希望很渺茫。

學者們認為，在中國現代性的關照中理解民族／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問題，是理解各大思潮的關鍵。學者們從國家目標、區分政府和國家、宗教立法、憲政體制、自我身份、追求自由的先驅實踐者等角度切入討論。自由主義學者指出，國家的有限主權是個人讓渡的，因此限權是天經地義的事，國家只是工具；左派學者認為，正因為國家由八十年代的「退出」到九十年代的「進入」，才帶來了二〇〇八年後明顯的大國崛起的盛況，「人們由於思想的懶惰和現實上的失職才會把『壞的可能性』全部推諉給國家，而把『好的可能性』落實在『市場』這個『資本主義』的完美化身上」（羅崗）。而儒家和基督教學者則希冀能出現一個各教平等、自由競爭的宗教市場，不要用政治、科學、理性宗教、國家或其他意識形態來代替教化或宗教的作用。有鑒於彼此的紛爭，也有學者宣稱，我們應該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用一種更為現實的方式推動公平社會（鄭也夫）。

四、

儘管話題很多，會場爭論非常激烈，四派學者最後還是一起簽署了《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簡稱「牛津共識」，一份只有八百五十八字的文件，包含對中國現狀和問題的認知，以及對中國未來設想這兩個部分。這是二十年來這四派學者首次公開達成的共識。正如高師寧教授所言，四派學者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哲學、史學、宗教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能如此聚集，已屬不易，而簽發共識，更令會議成為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牛津共識」九月四日在共識網上首次公開發表，在社會上引起一定的反響，更大的效應還在發酵中。

會議的成功召開和「牛津共識」發佈，也意味着中國基督教神學敢於和社會主流思潮進行對話的視野和底氣。最近三年的基督教熱，研究基督教的學院派和教會生活脱節，教會亦和學院神學缺乏交往，更遑論與主流學術圈來往。這次會議發起單位作為內地家庭教會的機構，能籌劃如此會議，並邀請到合作學者，實在體現出不凡的氣度。另外，會議中基督教是作為一種宗教思潮出現的，基督宗教並不能完全反映出其他四種國家認可的宗教的特徵和立場，會上缺少其他宗教的參與，就不能不説是一件憾事。

關鍵詞：政治神學　公民宗教　公共神學　基督教
中國社會

作者電郵地址：xiaohongzhu@fudan.edu.cn